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学刊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学刊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004-6466-2

I. 文… II. 中… III. 文学研究—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9217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 com)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9 插 页 2

字 数 50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杨 义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带星号者为执行编委)

包明德 叶舒宪 白 烨*

石昌渝 刘扬忠 刘跃进

吕 微* 孙 歌* 严 平*

张中良* 杨 义 杨匡汉

胡 明* 赵 园 党圣元

高建平* 蒋 寅* 黎湘萍*

发 刊 词

秉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及其学术委员会的委托，经过专家和编辑人员一年的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终于问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在已经有了三份杂志，这就是《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文学年鉴》，这三份刊物各有分工，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在为这些杂志感到骄傲之余，仍感到我们还缺乏这样一份连续出版物，她能提供足够的篇幅，将占有大量材料，体现长时段学术思考的成果充分展现出来。

1957年，文学研究所曾创刊了一份杂志，取名为《文学研究》。这份杂志创办的初衷，是要刊登文学研究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成果”。当年，在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余冠英、毛星、蔡仪、唐弢等老一辈学术名宿的关怀和努力下，这份杂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这本杂志改名为《文学评论》，以体现容纳“评论当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的要求。文学界的许多著名专家和后起之秀，几乎都在这里发表过代表作或成名作。这份刊物经过几代编辑人物多年来不懈的努力，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刊物。刊物的宗旨改变了，但《文学研究》办刊时的理想，仍深深地埋藏在文学所众多学人的心中。

五十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学术环境、学术人才、学术体制和学术方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迎来学术研究的空前繁荣时期。发展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学史，有着世界性影响的大国相称的文学学术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文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层次、多角度的开拓。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更需要坚实地立足于本国丰厚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当代智慧进行广泛的深度对话，开展有根基、有作为的创造性研究。我们要深入地研究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我们要不只是介绍，而是针对当代外国的文学理论发出

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文学研究的思想体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专门园地。

经过反复的斟酌，我们决定创办《文学研究所学刊》，以深入文学丰富复杂的事实，研磨其盘根错节的关系和演变脉络，究问其层层深蕴的本质、通则和规律。在学术方法上，我们提倡百花齐放，各尽所长。在学术步骤上，我们提倡博学深思，在长期的刻苦研究中，锤炼学力、悟力、思力相与为用的综合创新能力，以期把学术做深、做精、做大，做出精彩，力戒那种浮躁、空疏的学风，以及以抢滩、攻关掠取虚名的行为。我们的目的是传承学术传统之血脉，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新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努力与文学研究所现有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学年鉴》等几份连续出版物形成互补合作关系，以促进文学研究立体体系的形成。

我们在筹备和酝酿这份辑刊时，曾提出两条要求：扎实和创新。具体说就是：

一、倡导坚实厚重的学风，力求刊登研究者经过长期研究，占有大量资料，解决了相关领域研究中的问题，或者朝着这些问题的解决显著向前迈进的作品，努力铸造新时代的文学学术研究规范。

二、追求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本着与国际学术对话，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精神，力求深层理论探索和理论联系实际并重，树立学术研究中的创新之风。

我们深知，要达到这两条很不容易，但我们会抱定这两大目标，坚持不懈地向前走。希望海内外方家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让我们共同努力，抱着一片对学术的真诚之心，办好《文学研究所学刊》，为探索 21 世纪现代大国的文学学术的新形态、新境界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目 录

发刊词	(1)
关于古今贯通的方法论问题	杨义 (1)
东汉文人地理分布的变化与文学风貌的变迁	陈君 (31)
“阮公”与“惠孙”:陶渊明《咏贫士》诗未明人物考实	范子烨 (52)
李白的晋代情结	周勋初 (78)
论黄庭坚诗歌的比喻艺术	陶文鹏 (116)
论姚鼐的神妙说	王达敏 (130)
钱谦益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	蒋寅 (151)
“声情”与“言之不足”: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及其逻辑起点	刘方喜 (191)
汉文学东传研究法举例	张伯伟 (221)
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民间”	钱竞 (273)
鲁迅与梁启超、章太炎之大事因缘	张重岗 (295)
在殖民地台湾,“启蒙”如何可能? ——赖和对于台湾文学史叙述的挑战	赵稀方 (326)
文学中的“美学复苏”与“走出后现代” ——以两部小说文本看后现代诗学问题	毛崇杰 (346)
叠加单元:史诗可持续生长的结构机制 ——以季羨林译《罗摩衍那·战斗篇》为例	施爱东 (376)
母题与功能:民间文学关键词新解	户晓辉 (408)

Content

Foreword	(1)
A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ove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Literature	<i>Yang Yi</i> (1)
Changes i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Scholar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Shift of Literary Styles and Features	<i>Chen Jun</i> (31)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Unidentified Characters in Tao Yuanming's "On the Povert-Stricken Gentleman"	<i>Fan Ziyi</i> (52)
Li Bai's "Jin Dynasty Complex"	<i>Zhou Xunchu</i> (78)
On the Use of Metaphors in Huang Tingjian's Poems	<i>Tao Wenpeng</i> (116)
Interpretation of Yao Nai's Theory of the Miraculous and the Subtle	<i>Wang Damin</i> (130)
A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Poetics of Qian Qianyi	<i>Jiang Yin</i> (151)
"Feelings-Expressed-by-Voice" and "the Meaning Being Inexpressible by Speech" as Poetic Ideas	<i>Liu Fangxi</i> (191)
Instances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Zhang Bowei</i> (221)
"The Folk" as A Core Concep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Qian Jing</i> (273)
The Important Events among Lu Xun, Liang Qichao and Zhang Taiyan	<i>Zhang Zhonggang</i> (295)
In the Colonized Taiwan, How Could "Enlightenment" Be Possible? Lai He's Challenging of the Narr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y	<i>Zhao Xifang</i> (326)
“The Aesthetic Revival” and “Walking out of Post-Modernism” in Literature—Case Studies on the Post-Modern Poetic Issues through Two Novel Texts	<i>Mao Chongjie</i> (346)
The Superimposed Units: the Structural Mechanism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pics-Illustrated by Ramayana (Battles) Translated by Ji Xianlin	<i>Shi Aidong</i> (376)
Motif and Functio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Key Terms for Folk Literature	<i>Hu Xiaohui</i> (408)

关于古今贯通的方法论问题

杨 义

内容摘要：古今贯通与大文学观之间存在着相互为用的关系，讲古今贯通必须具备大文学观的视野，讲大文学观必然追求古今贯通的方法。大文学观的提出，主要是要给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大视野、大资料、大逻辑，把文学研究做大、做厚、做深、做活。在大文学观视野中考察，中国文学的学术文化存在“四库之学”、“四野之学”与“四洋之学”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的文学研究的古今贯通，存在着“能大始贯”、“有识方贯”、“知性求贯”等文化原则。

古今贯通有三个维度：时间性的古今，空间性的彼此，以及穿透性的内外。古今贯通有四种基本渠道：对原型思维的把握、对地理情结的透视、对精神谱系的梳理，以及对历史疑似的升华。古今贯通应是一种学问家兼思想家的贯通，是一种智慧和生命的贯通，是一种大文学观、大文化观的贯通。

关键词：古今贯通 大文学观 “三四之学”

一 大文学观下古今贯通三原则

古今贯通与大文学观之间存在着相互为用的关系，讲古今贯通必须具备大文学观的视野，讲大文学观必然追求古今贯通的方法。文学观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化视野、文化态度和文化胸襟的问题。大文学观的提出，主要是要给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大的视野、大资料、大逻辑，把文学研究做大、做厚、做深，同时又把它做活。我们传统的文学观是个杂文学观，杂文学观就是文史不分，文笔并举——孔门四科的文学。20世纪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文学

观，也就是纯文学观，让文学从很驳杂的状况下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学科形态和知识体系。但是任何一个把文学独立出来的做法，如果独立得过头，就可能把文学存在与整个文化的联系进行剥离和阉割。所以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纯文学是从西方的知识系统中产生出来的，用西方剥离东方，跟我们的文学实际、文学经验以及文学智慧存在着错位或偏离。杂文学观使文学被经史吃掉了，只有附庸的地位；纯文学观使文学被西方智慧吃掉了，它与文化的联系变得歪歪斜斜，或者残缺不全。所以我们要使文学完完整整地被吐出来，必须把这个拔出来被纯化的文学观重新放回到它原始的状态，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大文学观。这就是说，大文学观讲究还原，讲究非剥离化。

大文学观的学术战略，就是既兼容了纯文学观的严格的学科体系，又吸收了杂文学观的那种博学精思和融会贯通的思路，用这种内精纯而外渊博的观念来看古今贯通和中西融合的问题。过去大学里面的情况也值得反思——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么一种学科设置其实是使我们的整个文学的整体性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被割裂了，把一个完整的知识进行分隔，然后在分隔的状态下加以深入。因此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和古典文学的人，可能常常感到隔行如隔山。所以要还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就有必要做古今贯通的研究。只有古今贯通才能够把肢割了的片断直线缀合成复杂生动的完整曲线，才能够看到我们中国文学的整个血脉贯注和形态流变。

那么古今贯通要怎么样去贯而通之？它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不是说学了古典文学，再学了现代文学就贯通了。在这里一加一是大于二的，就是要贯通它内在的血脉，还原它本来的生命，托出它多重的价值。这就必须用大文学观来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学术文化背景。毫无疑问，把握文学存在的大学术文化背景，是古今得以贯通无碍的基本前提。过去搞现代文学的人往往受到海外学者的影响，认为现代文学跟古典文学断裂了，用这一点来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断裂了。实际上这是没有从整个中国文学的文化学术背景来考察问题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学的发展放回到中国自身的大学术文化背景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传统学术实际上是“二四之学”——两个“四”。

第一个是“四库之学”，按照王朝的价值系统，像《四库全书》一样按“经史子集”的学术框架建构我们的知识形态。与“四库之学”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四野之学”，就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就是被《四库全书》的知

识系统边缘化了的或者在这个系统的视野之外的一种学问资源。比如说在 20 世纪初期,发现了敦煌文献,敦煌文献实际上提供了跟《四库全书》不同的另一种图书馆。敦煌文献如果在乾隆年间出现,很可能就流失了,因为按照《四库全书》的价值系统来衡量,几万种的敦煌文献也就只有百十种能够进入四库全书的视野,其他大量涉及宗教、俗文学、边疆史地、民族关系的文献可能都被认为是不属于高雅知识系统。正是因为 20 世纪之初知识界对“四野之学”——民间的学问开始重视起来,所以“敦煌之学”才有可能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如果这样去看中国的学问,那么我们对五四时期的所谓“断裂”就另有所见,就能超越“断裂说”的遮蔽,进入异常复杂的文化演变的深层。五四的很多先驱者,实际上旧学的底子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们不是站在《四库全书》的立场而是站在“四野之学”的立场。鲁迅就曾经嘲讽过:“现在中西的学者,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① 不是说《四库全书》的修纂对于保存传统文献没有规模性的贡献,而是说那“钦定”体制给它衡文取舍的标准注入了深刻的王朝官方的价值体系,如鲁迅所说:“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所处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② 这种对“四库之学”的王朝官方的文化统制的批判,是采取民间的“四野之学”的立场的。而且在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大量的外来的思想文化涌入,又出现了一个学问——我叫它作“四洋之学”。这样就构成了处在不同的思想文化层面上的“三四之学”的大学术文化背景。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先驱者,基本上是站在“四野之学”的立场上,应用“四洋之学”来瓦解了“四库之学”的价值结构,对整个文学进行了一个重新的

① 《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8 页。

② 《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7 页。

整合和转型。

比如说鲁迅，我们能够说他对传统的学问不深吗？但是他对自己的传统学问，不是按“四库之学”的价值系统来架构。他的很多学问比如史学，就别有立场。浙东学术在清代就提出“六经皆史”，也就是把经学史学化，鲁迅就进一步把史学野史化，他认为野史可以看到一些往事的真相，正史却涂饰太多，装腔作势。史学野史化了的同时，他又加入了杂学，浙东之学很多是杂学，鲁迅在这方面的学问应该说是非常独到、非常深刻，而且也是非常渊博的。他用这种欣赏其野、不拘其杂的学问，再根据西方的思潮比如19世纪末的个人主义的思潮，或者突出精神作用的思潮，把它们加以选择、梳理、阐释和应用过来，在这个大知识背景中重新建构了中国的文学体系和知识体系。我们读了鲁迅的书可能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东西，鲁迅在1925年回答《京报》副刊的时候写了一份《青年必读书》，其中说青年人最好是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这其实就是一个读了很多中国书、学术修养精深的人交上的一张白卷。那我们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这份白卷就像宋元山水画一样，空白的意义要从“有”中去获得，解释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大学术文化背景。在1925年前后，整个中国不但读古书的风气很浓，而且按照古老的思维方式读古书的习惯尚未根本改观，在大多数的教育机构里还没有建立起按照现代意识来消化古书的教学科研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就有那么一些文化学者，比如梁启超和胡适都在大做《青年必读书目》。胡适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必读书目录，光是文史类推荐的书就有一千多种，就像一个小图书馆一样，估计胡适本人是不是全都读了都有疑问。当浑水尚待澄清，新机尚未启动，青年人还没有获得如何去读古书的能力的时候，铺天盖地地给他压上这么多古书目录，就可能像一个活埋庵一样把青年埋在里面，透不过气来。鲁迅讲青年人少读或者不读古书，第一是针对当时的文化状况，给青年思考文化问题一个权宜性的空间；第二也只有鲁迅才有资格来讲这个话，如果要其他人比如说林语堂这样的人来讲，那人家就会问你读了多少古书。也就像元代江浙人可以说近体诗讲究格律是害人的，但少数民族诗人就不敢讲这个，因为人家会问你懂格律了没有。所以鲁迅以翰林之孙、日本留学生、古书杂书读得极有体会的多重资格来讲这个话，要挽狂澜于既倒，要改变这种潮流，就另有一种分量。

但是鲁迅是不是主张青年人一概不读古书呢？不是这么回事。鲁迅有一个朋友叫许寿裳，他是鲁迅的哥儿，是情同手足的朋友。许寿裳的儿子叫做

许世瑛，1930年时，他20岁，考上了清华大学的中文系，请鲁迅给他开了一个中文系学生要读的书目。鲁迅开了12种，我统计了一下，总共是1081卷线装书。^①这个读书量大概也只够入门书的数量。分析一下这12种书目，是会晓得鲁迅希望青年人怎样读古书，有些什么样的教训，因为他是给他最好的朋友的儿子写的，是父辈对子弟的垂训。里面最大的一本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是746卷的书，中华书局影印出来是16开本的四大卷，是清人严可均编的。严可均因为没能参加朝廷主持的一个国家项目叫做《全唐文》编撰，他自己个人就下了个决心：唐以前的我来编，“斯事体大，是不才之责也”，所以他花了27年的时间编出了这部巨大的总集。这部书就把从上古到隋朝的所有的文章收到里面，当然有一些流行的本子像四书五经他是不收的。从鲁迅开出的书单首列这部书，可以看出，一是他主张青年人如果要研究文学史就应该读全部的文章，不可只读选本。鲁迅没有推荐《文选》，选本看到的是选家的眼光，被选家删落的文字往往隐藏着被历史烟尘遮蔽的文学原貌，在新的眼光下又可以重新放出光彩。第二是他没有选《全唐诗》和《全唐文》，那是御编的，带有王朝的价值体系在里边。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私家编纂，一定程度偏离王朝价值体系，比如说孔夫子在这746卷里头只收了27个字，第一条是鲁国都城城门失火了，孔夫子为鲁哀公写的一个救火的告令；第二条就是吴国的季札的儿子死了，孔夫子给他写了一个题墓词。这两条加起来27个字。所以它带有某种民间的立场，其他的三教九流、外国翻译的文字不少，可以供你在华夷、雅俗的多重视野中参照阅读。鲁迅还推荐了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不是《四库全书提要》，提要总共是200卷，简明目录只有20卷，把它缩编了。鲁迅在推荐这部书的时候加了一个注，说这是迄今为止的现有的较好的一本书籍的批评。就是说他主张研究文学史要读目录学的书，但是又说不要忘记它是“钦定”的，提醒你在价值体系上不能够完全按照钦定的标准，对它应保持分析的态度。另外他还开有其他一些书，比如说《世说新语》，注明从中可以知道当时是怎样清淡的，还有哪些书是可以知道当时的科举制度的，哪些书可以看到当时的士人的风习的。所以鲁迅开的书单具有独特选书标准和叙述方式，目的是要教会你怎么样去读书，他是把读

^① 《集外集拾遗补篇·开给许世瑛的书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1页。

什么和怎样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并思考的；其二，他主张研究文学史一是要看目录学的书，二是要看总集、全集，要在全面系统地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其三，是要从社会风气、士人风习、科举制度等多维角度来研究文学。他这种文学观就很接近我们所讲的大文学观，要讲古今贯通是应该在这种大文学视野中求贯通的。这就是“能大始贯”的道理。

如果能从大文学观的角度来看鲁迅的话，我们的鲁迅研究可能就会有更多新的认识。比如说认识到“有识方贯”的文化原则。鲁迅对魏晋文章是很喜欢的，他还在广州做了一个《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也是鲁迅准备写的文学史中的一章。三千年的文学史从魏晋切入，这隐藏着鲁迅深刻的魏晋情结。过去我们讲鲁迅和魏晋的关系，往往说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当然喜欢魏晋文章，鲁迅受他的影响也是应该注意到的。但鲁迅是绍兴人，绍兴的“越中山水”实际上就是魏晋山水，魏晋人所活动的地方比如兰亭、山阴道、鉴湖、天姥山为此流芳千古。讲浙东文化，应该注意人文地理学问题，两晋之际永嘉南渡，很多士族由于北方的“八王之乱”和五胡十六国的动荡都往南跑，当时东晋的首都是在建康也就是南京，王谢子弟在南京有乌衣巷，但是他们偏偏还要跑到绍兴去建别墅。谢东山，也就是谢安，高卧东山，为什么要到绍兴去？首先当然从安全考虑，因为首都在北面，相对比较安全，如果连会稽都保不住，那么整个朝廷就要灭亡了。南宋渡江，是跑到杭州，跑到临安，但是有些士族不在临安停下来，反而跑到绍兴。这里面很有文章，绍兴文化也就是“越文化”，不是王朝正统文化，但又是跟王朝发生紧密联系而且有深厚根底的偏锋文化，这种特点非常值得深思。谢东山在绍兴的东山高卧，就是有距离、有回旋余地的观世、入世和济世。如果他在乌衣巷，皇帝哪一天高兴就一纸诏书到乌衣巷把他宣了。他在东山呢？东山要两三天路程才能够到，到了之后他如果不愿见你，他可能去游山玩水了，你还找不到他。这种文化关系是很重要的，它培养了越中文化观世的深刻和济世的老到。其次，“越中山水”实际上就是魏晋山水，鲁迅小时候所走到的这些地方，都是魏晋人逍遥吟咏过的地方。魏晋文化通过山光水色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少年时代的精神世界。明朝有个袁宏道，袁中郎先生，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山阴道》，他把山阴道，把“越中山水”同杭州西湖相比较，他认为“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六朝人所知道的好山水是在绍兴、在越中。“彼此俱清奇，输他得名早”。杭州是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而且那种势头超过了“越中山水”。鲁迅是通过他的家乡的因缘、

地理的因缘接触了魏晋。

但是魏晋文化是一个大的集合体，在这个大的集合体中，鲁迅没有选择王羲之谈玄的名士派的传统，也没有选择谢灵运的山水诗派的传统。而是选择了嵇康和阮籍，他的器识、气质、时代感受和精神选择在这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过去讲鲁迅的精神结构，往往讲尼采、易卜生、克尔凯郭尔、斯蒂纳的影响，应该承认尼采对鲁迅的影响较深，易卜生他 also 知道较多，但对于克尔凯郭尔和斯蒂纳，鲁迅仅知道其名而已，没有专门的研究，他不过是把他们当作西方的世纪末思潮——张扬个性、推重精神、争天抗俗的潮流中人予以介绍。也应该承认，有这种世界知识和思潮的背景，极为关键，它使鲁迅的知识结构在四野之学、四库之学以外，又增加了四洋之学的维度。然而对鲁迅的精神结构影响最深的还是嵇康。我过去讲鲁迅的文章中有“嵇康气”，唐弢先生当时就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见解。鲁迅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校勘《嵇康集》，而且现在手稿都还有三部，从头到尾把《嵇康集》抄三次，用了七八个本子来校勘，从而成就了最有特点的《嵇康集》的精校本。以他积学深功的着重点来看，他对西方很多哲学家的了解远远不如他对嵇康的了解。嵇康实际上跟绍兴也有着深刻的因缘。根据鲁迅对他家乡的文献的收集，其中有一部《虞预晋书》里面讲了嵇康，说嵇康的祖上是会稽人，后来迁移到安徽的铨县，为了不忘记他的祖宗之地，把绍兴的“稽山”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作为姓氏，以表示不忘本。以一个姓氏勾连着跟鲁迅的深刻的乡土渊源，这也是很有意味的事。

鲁迅深知魏晋，他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讲得最出神入化的是哪一部分呢？讲得最出神入化的是关于魏晋的名士服用五石散这种有毒性的药。他说到服了五石散之后，身体就要发热，发热之后就要出去行散，还不能够穿新衣服，不能穿紧身的衣服，要轻裘缓带，衣服又不能经常洗，洗了之后容易擦破皮肤，所以很脏，里头长了很多虱子，“扞虱而谈”，抓了虱子一边咬一边在那里谈学，于是虱子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鲁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鲁迅是学过医的人，他懂药，懂得药性！重要的不仅在于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且更在于你发现了什么东西。如果换一个懂音乐的人去讲嵇康，可能就讲《广陵散》的妙处，讲“声无哀乐”的道理，他注意的是音乐。文学和文学研究是包含人的生命体验的，这种生命体验按之人情物理，古今有相通之处，因此我们可以引申出“知性求贯”的文化法则。鲁迅懂药言药，就连他讲《拿来主义》，也拿来了他的童年记忆设

喻。《拿来主义》中说有个大宅子，里面有鱼翅，有鸦片烟，有烟灯烟枪，还有姨太太，就看你以什么态度、什么原则去分别处理，处理得当，就是好的继承者和创造者，处理不当就成败家子。比如对于鸦片就有三种处理方法：一种是走进卧室去当吸毒者；一种是当众扔到厕所里，以显示彻底革命；还有一种是送到药房里面去，用作治病的药材，却不必大肆宣扬什么“祖传药膏，卖完即止”，不要到处炒作做广告。事物的用途当然和它的材质有关，但也可以用理性态度和科学手段对之进行转化，化害为利，变废为宝。不妨进一步细想一下，这个大宅子在哪儿？不是恭王府，不是王公贵族的府第，没有金银珠宝、金碧辉煌，也不是农家，摆满犁耙锄镰、猪狗杂物，大概是鲁迅故里的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那种大宅子。就是说它是一个将要破落的士大夫家庭里的宅子，反映了宅子里面的家庭结构、经济状况和行为方式。这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旧式家庭里面是很典型的。只要研究过鲁迅的家世的人都会知道，鸦片烟和姨太太对鲁迅这个家族的败落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他的祖父就是两妻三妾四个仆人。所以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包含着他的生命的原始印痕，在此后的写作中会经意或者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拿来主义不是随便拿来的，顺手掏着自己心窝，可能不经意地把原始记忆拿出来了。所以我们研读古今典籍，要独具慧眼地看到典籍背后存在一个活生生的人，唯有深入人性人情，才能沟通古往今来。

以上考察了“三四之学”，考察了大文学观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的学术文化背景。在这种“三四之学”的背景下的文学研究的古今贯通，存在着“能大始贯”、“有识方贯”、“知性求贯”等文化原则。这些原则是在研究作为古今贯通的关键人物——鲁迅的时候得出的，反过来我就用这些原则开发出很多新的文化资源，并且在新的视野和新的逻辑中深入地清理古今各种文学元素运行的轨迹、组合的方式和变异的形态。

二 古今贯通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古今贯通既是大文学观的一项题内之义，同时又只有用大文学观才能“斟酌古今，贯通条理”，贯通得顺畅而且深厚。从语义学上说，贯的本义是钱串，古代铜钱用绳子穿起来，以千钱为一贯。通的本义是道理通达，《易经·系辞上》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孙子兵法·地形篇》更接近本义：“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贯可以是纵贯，也可以是